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 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实践<sup>\*</sup>

解丽霞 邱 婕

〔摘 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始终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法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转向民主和民生建设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更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实现了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享，解决了“谁当家作主”和“如何当家作主”的根本问题，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 法治建设 民生政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2-0001-07

从词源学上考察，“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由“demos（人民）和 kratos（统治）”<sup>①</sup>组成，意为“人民统治”。马克思指出“民主”是“人民当权的”，<sup>②</sup>即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经验，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权为民所有的新政权

国家权力归谁所有，是民主的首要课题。民主重在回答“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sup>③</sup>问题，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回答了“谁”当家作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实现权为民所有。

### （一）权力结构的民主化变革：从资产阶级民权到无产阶级民主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8ZDA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解丽霞，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641）；邱婕，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210023）。

① [美] 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③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屡屡挫败表明,从西方拿来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寸步难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新,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伴随“人民”的出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救国之路。

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精髓,强调民主共和必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宣扬“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sup>①</sup>但在国民党之后的革命实践中,表面的宪政体制掩盖了由少数人操纵的政治权力结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蓝图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吸取新三民主义的精髓,提出“人民民主”。他认为,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sup>②</sup>毛泽东洞察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必然导致革命不彻底,故提出“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sup>③</sup>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打破固有权力结构,实现由资产阶级享有民权转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

## (二) 人民主体性彰显: 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变革了中国政治的权力结构,那“人民”究竟指什么? 马克思认为,“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sup>④</sup>“人民”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所有无产者,它“比无产阶级有着更广泛的所指”。<sup>⑤</sup>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强调人民民主,以实现权力属于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人民”的范围在民主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人民”在无产阶级之外涵括小资产阶级,中共二大提出“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sup>⑥</sup>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者’”。<sup>⑦</sup>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sup>⑧</sup>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sup>⑨</sup>资产阶级也被纳入“人民”的队伍。

“人民”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sup>⑩</sup>人民是“历史剧的剧作者”<sup>⑪</sup>“人组成人民的集合性存在是国家产生的现实基础”。<sup>⑫</sup>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力量不断被纳入“人民”阵营,成为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逐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 (三) 实现民主关键一步: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sup>⑬</sup>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使无产阶级成为新的国家主权者,走出了民主革命的关键一步。

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实践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革命的进程为:“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

①《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14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⑤陈培永:《重思马克思的“人民”概念》,《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⑦阎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⑫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sup>①</sup>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sup>②</sup>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征程。民主政治建设并没有统一标准，旧民主主义革命表明西方民主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政治制度应根植中国土壤、立足中国国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实践的第一个重要成就。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权为民所用的民主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权为民所有。那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权力如何运行，人民通过什么方式行使权力，成为亟需回答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制度设计上，以民主的广度、深度、范围为标尺，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解决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

### （一）选举民主：确保民主的广度

民主的广度指“社会成员中参与决策的比例”。<sup>③</sup>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坚持民主集中制，通过选举民主让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确保政治权利非少数人所有。由此，社会主义民主确定了适当的广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民意置于首位，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sup>④</sup>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制”民主，有别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分权制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选举程序上，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真实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的权力本身是民主的制度保证”，<sup>⑤</sup>民主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区别于西方一人一票的“一般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以看似民主、公正的程序设计遮蔽其阶级性，实质是资产阶级享有的少数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对人民负责、维护民意的代表，人大代表收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民主和集中、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使广大人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最大广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 （二）协商民主：开掘民主的深度

民主的深度，是指参与的质量。协商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sup>⑥</sup>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充分且包容地展开理性对话。

协商民主具有对话性，人民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社会联合。“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sup>⑦</sup>在我国宪法中已明确规定，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对话性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减少由政治、经济资本的不对称性带来的不正义，尊重他者权利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汇聚党和政府、社会、人民力量，以对话合作挖掘人民民主的深度。协商民主具有公共性，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协商民主的公共性在于开辟协商的社会空间，其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sup>⑧</sup>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协商对话，尽可能就公共议题取得共识，有效整合社会多元化群体。协商民主彰显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不同阶层都能享有当家作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6页。

③[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3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1页。

⑤[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⑥[美]科恩：《论民主》，第21页。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50页。

⑧房宁：《民主的中国经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权利,通过理性对话充分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 (三) 自治民主: 拓宽民主的范围

自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践中的创新,基层群众性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将民主的范围推广至各少数民族地区,使民主深入至社会管理系统的基层,有效保障人民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治民主具有双重效应:就共同体而言,它有助于共同体成员的合作与团结,培育公共精神;就整个社会而言,它有助于人民共同利益的表达与实现,促进社会和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更大范围的自治民主。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sup>①</sup>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推进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并维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赋予各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自治权,确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基层群众自治激活了人民自主性和社会自治性。我国的代表制民主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引入群众自治,融合了直接民主的要素。1949年后,农村形成“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sup>②</sup>等基层社会组织,城市开始出现防护队、防盗队和居民组等群众性自治组织,逐步建立起以乡村农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等为具体组织形式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人民从依附性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当家作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提升自我效能感,培育“民主性格”,<sup>③</sup>维护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民主是一系列程序,民主政治有赖于制度运转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权利运行机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建立权为民所赋的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步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如何确保国家权力运行的公正性,成为民主实践面临的新难题。解决此难题的关键是要保证权为民所赋,要规定权力的来源及其合法性基础,以法律捍卫人民权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建设,建设依法治国的法治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 (一) 法制建设的缘起: 规范国家权力运行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波三折。面对现实困境,邓小平提出:“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sup>④</sup>为遏制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的法制建设应时而生。

沿着民主和法制关系的思路追问: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何以共生?法制建设何以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法制为国家权力运行划定轨道。首先,民主需要法制予以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sup>⑤</sup>因此,民主建设迫切需要对专制主义传统“祛魅”,使民主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其次,法制是反对专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免受侵害的屏障。法制是以他律为特征的行为规范,通过建立确定性行动框架,有效防范权力失控或异化,使民主正当运转。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保驾护航,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全面落实期。

①《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③[美]卡罗兰·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 （二）法制建设的路径：国家权力回归人民

法制建设为国家权力运行划定轨道，是对人民的国家权力赋权者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国家权力回归人民。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sup>①</sup>“赋权”思想可追溯至卢梭，人们让渡一定权利，结合成更强大的集合力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sup>②</sup>协力抵抗生存的阻力。赋权需要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由人民所赋予的国家权力服务人民，人民赋予民主政治生命力，法制赋予民主政治行动力。法律能赋予民主政治以行动力，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分配利益，表达人民公共意志。亚里士多德认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sup>③</sup>权为民所赋的法治机制，确保了法律和人民权利的有机统一。

其一，权为民所赋决定了人民是权力主体，“良好的法律”通过对人民权利的确认，落实了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法律责任。以公权力而言，人民是赋权主体、公权服务对象，国家接受人民权利让渡而成为服务人民的主体。在作为服务主体的国家与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之间，通过明确权力行使者为人民服务的法律责任，建构了主体间性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如恩格斯所言，“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sup>④</sup>法律的关键在于自觉表达人民公意。

其二，国家权力源于人民是权为民所赋的核心，由人民意志确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强化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效力。正因为法律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自觉遵守，内化为行为规范和律令，法律的行动力才得以发挥。法律作为赋权者的意愿集合，是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民的准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为了让制度获得普遍认同与遵循，中国共产党以法律打造权力的铁笼，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 （三）法律权威的树立：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民主与法制结合，发挥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sup>⑤</sup>依法治国，强化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方向。依法治国，将“法制”上升为“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树立法律权威，强调政府要贯彻执行法律。所谓“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sup>⑥</sup>“法治民主”意味着从“人治”转变为“法治”。罗隆基指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sup>⑦</sup>法治实现权力非人格化，为民主政治构建权力制约机制。

依法治国，通过法治建设达至民主政治。法治建设与民主建设共生：一方面，法律确立民主的内容。法律反映的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政治利益，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由此确立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法律确定民主的制度化形式。法律将国家、社会、政党三维政治结构的权力关系固定下来，通过明确规则来约束权力，确保权力运行的正当性。法治以法律的绝对权威划定群己权界、限定国家权力、监督权力运行，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为人民权利提供法律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能够约束国家权力运行，落实权为民所赋。

①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

②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67-568页。

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⑥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78页。

⑦ 罗隆基：《人权法治民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权为民所享的民生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强调权为民所赋，最终目的是实现权为民所享。中国共产党旨在响应人民呼声，“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维护人权最基础、最首要的工作。”<sup>①</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权为民所享，重点是民主和民生的有机统一。

##### （一）民生建设：实现民主的旨归

民主和民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生性环节。人民当家作主追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民生建设的旨向。民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使命。邓小平指出，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评价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sup>②</sup> 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政治体制的标准，表明民主建设的落脚点是民生建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向更加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实质民主，民主政治的内涵因民生而不断丰富。民生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核具有同一性，本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民生是民主建设的现实基础。纵观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历程，人民民主发展有赖于民生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任务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民生建设隐而未彰；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人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民生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分配的公平公正，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

##### （二）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人民生存权

贫困关涉人类基本的生存权，判别标准是难以获得维持生存的最低需要量。“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sup>③</sup> 绝对性贫困意味着基本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民生短板。消除贫困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后一公里”。

我国脱贫攻坚从粗放解决整体贫困到精准实现个体脱贫，全方位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首先，力图使实现当家作主的人民获得经济解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响了脱贫攻坚战，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服务，使人民获得经济生活保障。其次，精准扶贫脱贫保障每个个体的生存权利。针对空间性集中贫困与剥夺性失衡发展，精准扶贫脱贫战略着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从“大水漫灌”转向区域瞄准、从宏观减贫转向区域集中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发挥民主和民生建设合力。第一，民主是扶贫脱贫的助力。通过加强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使广大贫困人口参与民主决策、管理、监督，建立参与式扶贫模式，自下而上推进扶贫工作。第二，扶贫脱贫是民主的绩效。民主和民生结合的关键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共享发展中发挥主体的本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以精准扶贫脱贫为基本战略，建设保障个体生存权的共同体。

##### （三）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维护人民发展权

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是人民性与价值性的同一，民主政治需要保障人民幸福的民生福祉。关于“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对比了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认为“幸福的生活就在于德性的实现活动”。<sup>④</sup> 享乐的、政治的生活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幸福的生活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民主建设指向“共同善”，即共同体富足以及个人全面发展，实现美好生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应然价值取向。

从脱贫攻坚到美好生活，是从满足人们生存性需求到更高级需求的发展进程。“民生建设，不仅关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③ [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10页。



注人们的生存，而且关注人们的发展”，<sup>①</sup>精准扶贫脱贫是满足人民生存性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回应全面发展的更高要求。“‘小康社会’之后，应是‘公正社会’”，<sup>②</sup>要求“五位一体”建设的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民生建设，“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sup>③</sup>民生建设的着力点从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转向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社会资源分配向老、弱、病等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推动社会平衡发展。

从保障人民基本生存到实现美好生活的民生建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实践。党的十九大提出民生建设的定位和具体政策指导，坚持权为民所享，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将人民的整体生存和个体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增强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生政治与民主建设相呼应，以权为民所享为目的，从改善人的基本生存，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保障个体的物质财富，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关注绝对贫困的整体性问题，到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④</sup>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成为国家权利的拥有者，回答了“谁”当家作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雏形，解决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建设法治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有法律保障；新时代，民主建设和民生建设紧密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其一，确证权力的合法性。坚持人民是权力的来源、民主的主体，国家权力合法性源于人民。其二，确立权力的正当性。通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建立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政治结构，推进人民政治参与和社会自治。其三，确保权力的共享性。通过民主建设和民生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这一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积累了协商民主的中国经验。

责任编辑：王 冰

---

① 林尚立：《论人民民主》，第 113 页。

② 杨光斌：《让民主归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02 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9 页。